

2000 中国经济展望

(上)

国家信息中心 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 中国经济展望 (上)

国家信息中心 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主办：国家信息中心

承办：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协办：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北京弄潮咨询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2000 中国经济展望》(上) 编委会和编辑工作人员

顾问：王春正 高纯德 高新民 乌家培

编委会主任：刘 鹤

编委会副主任：徐漳河 王长胜

编委会委员：杜 链 夏道藏 田凤翥 徐鲁溪 曾安平
张元生 徐宏源 陈小虹 梁优彩 张加强
马 欣 徐 愈 宁家骏 步德迎 魏安力
张学颖 徐连仲 祝宝良 李国斌

主 编：王长胜

副 主 编：徐宏源 胡少维 王树图

编 辑：高辉清 祁京梅 张 峰

范 芹 陶丽萍 张永军

责任编辑：祁京梅

《2000 中国经济展望》(上) 特约撰稿人名单

(按文序排序, 排名不分先后)

刘 鹤		国家信息中心
乌家培		中国信息协会
刘福垣		国家计委宏观院
杨宜勇		国家计委宏观院
刘南昌		国家经贸委
李晓西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 淮		国务院发展中心
韩永文		国家计委
李云林		国家计委
蒋万进	马若虹	中国人民银行
汪义达		财政部
钟正岩		外经贸部
戴冠来		国家计委
戴定一		中国物资信息中心
邢毓静		国家外汇管理局
李善同	翟 凡	国务院发展中心
唐 玲		国家计委
王国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应 坚		国务院港澳办研究所
谷源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陆 燕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谭雅玲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郭培兴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前 言

1999 年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央实施了积极进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并适度加大了经济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全年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都取得了新的进步。国内生产总值预计比上年增长 7.3%，尽管从增长速度上看国民经济仍处于持续回落之中，但综合起来看，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提高，企业效益开始回升，库存比率下降，亏损额减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引发的持续通货紧缩未有明显好转；企业下岗人员增多使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势头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发展与农村社会稳定。

针对上述问题，1999 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经济调控举措，主要包括：粮棉收购政策作出调整以鼓励优化种植结构；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提高出口退税率；增发 600 亿元建设国债，并通过贷款贴息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大幅度提高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降低投资方向调节税，对使用国产设备的投资实行所得税部分抵免；恢复开征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方向和重大措施。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第三季度经济发展已出现回升迹象，相信有关政策对 2000 年经济发展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999 年宏观调控实践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理论界和管理层对我国通货紧缩的现状及其危害性基本达成了共识，对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坚持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克服通货紧缩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这一点决定了 2000 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仍是扩大需求、稳定经济、增加就业、促进改革，从而保证了 2000 年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都会保持相对宽松。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因此，2000 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将好于 1999 年，有利于扭转经济持续减速的被动局面。

本书是国家信息中心连续第九年编辑出版的大型年度经济预测报告，在保持原有年度预测报告固有内容即对宏观经济各方面包括国内外经济环境、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各省市经济、各主要行业、主要产品市场 1999 年运行情况和 2000 年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外，还组织了三个专题：当前宏观调控热点问题研究、“十五”规划重大问题研究和通货紧缩问题研究。本书继续突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特色，并在研究深度上做了一定改进，以期帮助读者在把握全面情况的同时，对一些热点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由于这套书涉及范围广，编写时间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指正。

目 录

专 题 篇

● 宏观热点问题研究

扩大有效需求与培育新增长点相结合 拉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3)
关于网络经济的几个问题·····	(9)
城市化的三字经要倒过来念·····	(16)
积极扩大总量需求 促进经济平稳回升·····	(23)
创造景气环境 改善社会预期促进经济启动·····	(29)
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36)
加大政策力度 力促通缩缓解·····	(43)
搞好二次开放 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努力恢复经济增长活力·····	(52)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方式及政策选择·····	(58)
200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难点分析·····	(66)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探讨·····	(74)

● 通货紧缩问题研究

通货紧缩成因 趋势及国际比较·····	(82)
正视通货紧缩压力 加快微观机制改革·····	(90)
克服通货紧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98)
中国应对通货紧缩的政策对策与前景展望·····	(109)
抑制通货紧缩的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17)
日本治理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	(121)
经济学界关于通货紧缩的争论·····	(128)

● “十五”重点问题研究

“十五”时期国民经济增长格局预测分析·····	(134)
“十五”时期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取向的几个问题·····	(141)
建立有效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 促进经济发展·····	(145)
“十五”我国消费需求特征分析及政策建议·····	(150)
“十五”时期我国人口就业发展态势与政策目标·····	(156)
“十五”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战略·····	(162)

宏观篇

2000 年国民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与分析	(169)
“九五”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展望	(182)
1999 年金融形势分析与 2000 年货币政策展望	(189)
1999 年财政运行态势分析及 2000 年展望	(196)
1999~2000 年固定资产投资走势分析	(200)
1999 及 2000 年我国消费品零售市场预测	(211)
1999 年外贸外汇形势分析及 2000 年展望	(219)
1999 年中国物价和 2000 年展望	(229)
迎接新世纪的中国生产资料市场	(237)
1997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与展望	(243)
加入 WTO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52)
2000 年中国宏观经济周期走势分析	(260)
1999 年工业景气分析及 2000 年趋势展望	(266)
1999 年我国利用外资的发展趋势及 2000 年展望	(276)
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异动机制探析	(284)

地区篇

1999~2000 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分析和预测	(293)
北京市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08)
天津市 1999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15)
河北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23)
山西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28)
内蒙古自治区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38)
2000 年辽宁经济展望	(346)
吉林省 1999 年经济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52)
黑龙江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59)
上海市 2000 年经济展望	(368)
江苏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78)
浙江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386)
1999~2000 年安徽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394)
福建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03)
江西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14)
山东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25)
河南省 1999~2000 年经济分析和预测	(434)
湖北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43)
湖南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54)

广东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63)
广西“九五”以来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70)
重庆市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478)
四川省 2000 年经济展望	(486)
1999~2000 年贵州省经济运行分析及展望	(495)
2000 年云南省经济展望	(503)
陕西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510)
甘肃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517)
青海省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524)
宁夏区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531)
新疆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537)
香港 1999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00 年展望.....	(546)

世界经济篇

世界经济形势走向及其缺陷与变数.....	(557)
走向 2000 年的世界贸易	(565)
国际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前景.....	(574)
国际商品市场价格走势分析及预测.....	(582)

专 题 篇

扩大有效需求与培育新增长点相结合 拉动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

刘 鹤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币值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成长。它意味着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正常，经济结构合理，增长速度也比较高，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实际经济的运行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有时高经济增长干扰着稳定，有时稳定又制约着正常增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又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处于跨世纪之交，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供给约束走向市场需求约束，因此现阶段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总需求必须充足。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应状况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是我们做好 2000 年经济工作的基础。

一、反通货紧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1997 年下半年各类物价指数先后出现负增长的实际情况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经济正经受通缩的威胁。通货紧缩中价格总水平不断下跌，它创造着失业，损失着有效生产能力，导致国民财富的流失。习惯于生活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学家往往低估通缩，无论西方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中国通用的经济学教材，都没有将通缩作为主要的分析内容，可见通缩的危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事实上通缩的危害性可能要远高过通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述：“通胀和通缩一样可怕，后者甚至危害更大”。

与通胀一样，通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是太多的商品在太少的货币流中运动，结果是，尽管商品价格已经一降再降，仍然不能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厂商因价格水平的普遍持续下降而出现大面积亏损与事实上破产，经济增长的动力与厂商的投资需求全面衰减。中国经济正面临这种潜在危险，货币供应量及由此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明显不足，因此，造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有人常用 GDP 和价格增长与 M2 的增长速度说明目前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这种看法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它忽视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1995 年，我国 M1 流通速度为每年 2.44 次，以后年份不断减缓，1998 年下跌为 2.04 次，预计 1999 年跌至 1.88 次。用目前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说明问题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忽略了通缩的背景，通胀期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率加计划价格增长率；而通缩期货币供给的目标则应是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升率再加上一个矫正区间，之所以提出一个矫正区间的主张，就在于缓和价

格下跌引起的货币流动性下降。也就是说,在通缩期,需要树立矫往过正的思想方法,以抵消货币流动性减弱→通货收缩→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减弱→通缩加剧的恶性循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999 年社会总需求(现价)预计增长 5.5%,已经大大低于当前 GDP 的自然增长率水平。因此,目前经济总量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尽最大可能拉动总需求,力求使其增长率达到或接近 GDP 的潜在增长率。但对这一点,各界看法不一,有两种有代表性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即便总需求不足,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也影响不大,在需求紧缩中恰可以加快结构调整,淘汰过剩能力,促进技术进步。静态地看,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在这个过程中,固然可能淘汰一部分劣质生产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相当一部分在物理上适销的产品也失去了市场,从而造成生产能力的巨大浪费和国民财富的损失。初步估计,目前钢材、水泥制造业生产能力的 95%,设备制造业生产能力的 75%及家电业生产能力的 80%在正常的需求约束下都是有效的,但目前其生产能力利用率分别仅为 85%、40%和 40~50%,如果折合产值,通缩情况下每年损失的社会财富达数千亿元。另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失业,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动态地看,通缩同样存在负乘数和减速机制。总需求结构中任何一项的减少,都创造着某种不景气的预期,它使收入进一步减少,支出持续下降,市场容量缩小,信用和金融萎缩,价格下跌,因此形成不良的循环。以日本为例,经济一陷十年,失去了很多机会。另一种看法是,目前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结构合理了,产品对路了,自然会有需求。这实际是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然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如果把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也就失去了讨论的基础。即使结构调好了也不等于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果仅通过结构调整就可以实现总供求均衡,那宏观政策就不必存在了。(结构调整的确十分重要,这个问题我在第三部分会专门论述,但对扩大总需求也不能低估。)在现有的及不断缩小的市场空间中,供给体系确实过剩,不然不会出现价格下跌。但目前有 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把这个比例下降 10 个百分点,形成城市规模,需要多少水泥、钢材和能源呢?目前的生产能力用于建设一批新城市无疑不是过剩的,甚至略有不足。再比如,虽然家电普及率在城市几乎达到 100%,但 90%以上的家庭要对彩电、冰箱、洗衣机更新换代,对大部分居民来说,问题不在于品种不对路,他们看中的产品就在商店,问题是普通居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或即期购买力不足。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通货膨胀假说的理论和政策框架之中,20 多年来,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接受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充分竞争”的思维逻辑,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心理预期经历的调整,我们已经步入通货紧缩型的经济阶段。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替代传统技术,知识和资本排除传统产品和工人,价格随技术因素内生性下降。通缩成为困扰我们日常生活的恶梦和现实,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由通货膨胀问题转向失业问题,棘手的问题可能不只是通胀,也包括如何有效地扩大需求。

二、总需求扩张的三个渠道

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总需求不足，的确有极其复杂的内生和外生因素，但具体地讲，除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多引致价格下降之外，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

第一，外资进入少了，经常项目结汇量下降，使基础货币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供给渠道。金融危机发生前，外资大量进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国内，外币换成人民币后形成现实的货币供给；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通过结汇方式形成了货币供给，这两部分是基础货币增加的重要因素。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出口贸易面临严峻挑战，1998与1999连续两年我国出口总值低速增长，导致经常项目结汇明显减少。随着东亚经济的逐步回稳，这些经济体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增强，与我国形成竞争关系，使我国外商投资出现下降，导致从这个渠道供给的基础货币大量下降。（现在有些经济分析仅从外资进入中国的绝对数量来判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忽视了对扩张总需求的乘数作用，显然是要澄清的）；第二，商业银行的行为由盲目扩大贷款转为“惜贷”，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无论其可理解程度有多高，现实的结果是，这种行为引致信贷收缩。有人说，现在不是银行“惜贷”，而是“争贷”，但无好项目，这不是实际情况，因为目前真实利率（指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如中小企业、乡镇企业与农民实际获得贷款的利率）仍然大大高于官方利率。第三，消费者支出下降。这固然与经济下滑、增长减速及对改革预期有直接关系，更为直观的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支出欠账。长期以来，居民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项目没有列入工资，由国家统收，国家代替国有部门的员工进行长期储蓄，储蓄已转化为投资，形成目前生产能力中的相当部分。当这部分能力要在市场实现时，如实现企业产权重组、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股权等市场化改革时，国有职工的利益只能得到部分、局部的偿还，同时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统支中止，而居民尚未形成自我循环的支付基础。上升到总量的高度，显然出现总需求不足。

可能还有其他引起总需求下降的原因，但对比来看，上述三点是引起总需求在同一口径下减少的最直接原因。三点都不是微观领域的局部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地引起总需求扩大，调整结构也同样无法扩张总量，必须从宏观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从总供求调节的宏观角度加以解决。当然，具体入手点又是非常微观的，在中国的宏观经济体系中，微观主体不是黑箱中的等价物，而是存在明显个性差异的行为主体。

上述分析表明积极有效地扩张总需求已经成为解决当前经济总量问题的关键，宏观调控政策应围绕扩张总需求做文章。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1. 增加现有货币供给的渠道，研究创建新的渠道，鼓励金融创新和改善金融服务

目前的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让人进退两难，若鼓励其扩大信贷则担心呆坏账增加，若维持现状又制约正常的经济增长。客观地看，尽管银行的改革在推进，但有三个问题制约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是日益强化的垄断经营，正影响这个体系的市场效率和适应性；二是缺乏来自所有者产权收益要求的压力，银行乐于买进国债，凭借债权收入顺利支付储蓄利息，而不必寻求进取或冒市场风险；三是分业管理也制约了商行的进取性，在目前通货

紧缩条件下,项目贷款的边际收益率正在下降,几十个好项目贷款的收益可能被对一个项目的错误贷款全部冲销,既然被锁定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慎审是最明智的现实选择。虽然很多研究人员强烈反对“流动性陷阱”的提法,但目前的国有商行体系恰恰陷入了这个“温和的陷阱”之中。从宏观上看,目前的局面是,央行正推进比较灵活的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准备金比例、调整贴现率、降息等各种办法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商业银行的情况,极大地抵消了央行的意图,形成“开闸放水、库满河干”的局面,这种状况必须转变,不然会使宏观政策的可操作性严重受挫。具体的政策建议是:从外部形成对商业银行利润动机的压力,国家提出明确的利润指标要求,促其调整内部治理结构;鼓励竞争,条件成熟时,适度引进来自非国有部门和外部的竞争压力;安排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时间表,研究混业经营的国际惯例,用试点的办法逐步推广。

上述政策的具体化和实施都需要时间,当前比较见效的办法是继续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这是当前诸多选择之中唯一立竿见影的办法,中央坚定地选择这个办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认为,目前不必顾及各种议论,要坚定不移地把这个政策推行下去,并作为一项中期宏观调控政策坚持四至五年不变。日本启动经济的教训在于犹豫不决,反复无常,直到最近,在扩大公共支出问题上才下定决心,我们要避免那种反复。目前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达到扩大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避免“挤出效应”。有两种现实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央行回购商业银行持有的部分国债,保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正常增长,关于这一点,经济界已有建议。另一种办法是,把财政资金的项目支出转变为“种子资金”支出,组成若干机制好、专业人员经营管理、股权结构合理的基金,一方面吸收机构和个人的资金,另一方面投向边际产出率高的项目和企业,从而放大财政政策的关联作用。这种做法既可以实现由财政独撑的局面向政府与民间资金并举局面的转化,也有利于校正资本市场的扭曲,实现股市与债市的两个景气。这是财政政策的创新,具有重大战略含义。

2. 扩大利用外资

经常项目结汇的增加取决于国际市场、贸易条件、汇率及配额等多方面的约束,扩大出口的努力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无疑要继续坚持。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是利用外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以透明的法律和法规取代随意性强的部门意志。比如:最近,有的部门提出了全面管住ISP(信息接入服务)和ICP(信息内容服务)的意见,引起种种猜测,这种现象该如何对待,显然事关重大。第二,审慎地放宽一些产业领域的进入条件,逐步落实我国政府对外的公开政策原则,这涉及到从初级产业、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众多领域。1998年以来,各国投资者注意到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过大的风险,也感到其股市繁荣之下的泡沫。为防止风险,投资组合的调整已经开始,相当多的资金回流亚洲,1999年这个趋势日见明显,我们显然有必要研究和抓住这个机遇。如果利用外资的数量有一个明显提高,可以有效增加货币供给,缓解总量矛盾。

3. 配合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提出一个“还产于民”的补偿方案,把景气预期现实化

国有部门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十五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现在的问题在于实施。实施的难点仍然是“人往哪去,钱从哪来”,仍然是社会保障问题。近期看,通缩意味收入的整体性下降。历史地看,统收之后的钱没有实现统支。向前展望,当前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期,如果真是形成几年景气不振的局面,后果是严峻的。我们

认为,既然存在巨大的有效潜在生产能力,就完全可以也应当把历史上的欠账变成现实的支付能力。具体办法是,建立个人社会账号,形成个人基金,还产于民,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支出方法和每月可支出数量严格界定,基金仅限于个人使用,不可继承。这项工作,无论在经典的理论中,还是在现代宏观理论上,都可以找到依据,也完全符合我党确定的“按劳分配”原则,困难之点在于公平合理的计算,但这并不是做不到的。实际上,只要决定这么做,居民的心理预期就会变化,消费市场的景气就会出现。另一个难点,是新人与老人之间的矛盾、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显然需要审慎和认真地加以研究。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孰重孰轻的决策选择范围,如果确认增长和反通缩是战略的优先重点,至少可以进入第二层次即关于补偿标准的设立、补偿总量的测算等具体问题的讨论。

三、扩大总需求与长期增长点的结合

中国经济是个增长型的经济,也是结构转换的经济,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周而复始地运转,必须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更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体制。当然,所有的经济都不可能同一水平涨落,但中国要求变革的力量更大。因此,扩大总需求必须与经济的长期增长相结合,着眼于未来的趋势和机会。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之外,至少还有四个领域是特别需要重视的,即城市化建设、服务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和信息产业的加强。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率 20 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拓展市场空间的巨大潜力所在。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决定加快城市化建设,逐步把农民转入城市,可以为钢材、水泥、能源、设备制造乃至轻工产品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平台。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在重复一句话,当今世界还有两大市场,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二是美国的信息技术,这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前 20 年的教训是,我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城市化方针,城市推进规划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滞后,虽然长出了 20 万个小城镇,但相当部分的生命力令人怀疑,因为它们的规模太小,难以形成城市功能。“十五”规划期即将到来,非常有必要把城市发展和建设做为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设想,如果“十五”期间建设或扩改建一批人口达到 100 万的中等城市,再发展一批人口达到 10~20 万的小城镇,会派生出多大的内需,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

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明显滞后。在工业制成品全面出现价格下跌的情况下,1999 年与 1995 年相比,服务业价格上升了 42%,年均上升 12.4%。即使在通货紧缩的 1998 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 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由 1996 年的 28% 上升为 1998 年的 36%。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服务业比重仅从 1996 年的 30.7% 上升为 1998 年的 32.8%,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服务业是今后增长的潜力所在,但目前的问题是,凡是价格上扬、供不应求的服务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垄断。国家一方面要适当增加对这些部门的投资,更重要的是逐步拆除进入壁垒和打破行业垄断。

中央 1999 年起开始又一次重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对中国经济来说,通缩为传统产业的更新提供了一次机遇。发达国家正大规模地向海外转移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当多的

发展中国家由于企业不景气而为产业发展方向困惑，我们如果抓住机遇，确实可以有所作为。最近，不少海外媒体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可否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大的生产基地，实际上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移动通讯设备、计算机、汽车、造船和设备制造业都存在可能，就看如何下决心。当然，我们不能盲目求大，要继续着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全力以赴建立高质量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这些前题下，在几个关键领域实施扩张性的产业政策是极好的机会。

网络时代的到来，迅速改变着人类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我国在硬件设计及基础研究领域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但硬件（计算机、通讯、网络设备等）正受摩尔定理支配，体积每 18 个月缩小一倍，价格相应下跌 50%，使得这个生产领域的边际收益日益减少。人们意识到，今后带动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柱是软件和信息内容，而恰在这两个领域，我们享有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以软件产业的发展为例，其发展依赖于民族的智力水平，并取决于国家的市场规模、对制造标准的控制、对开发人员的有效激励和组织。在这几方面，我们都可以大有作为，如果国家下大气力支持这个产业优先发展，形成自己的标准系列，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吸引人才，建立“种子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就完全有可能在几年之内超过印度，成为名副其实的软件生产大国。

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如果把积极进取的短期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增长点有效结合起来，我们至少可以实现 20 年以上的次高速增长，为在 21 世纪中叶全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